

文学的今天和过去

◎程光炜 著

经过十余年的磨炼，学院批评悄然建立起了一座辉煌的批评大厦，逐步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迷茫而又喧嚣的状态，重新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并显示出具有本土经验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和广阔前景。『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把学院批评大厦建设得坚实而多姿。

学院批评文库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文学的今天和过去

程光炜 著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学院批评文庫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今天和过去 / 程光炜著.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9
(学院批评文库/刘中树, 张学昕主编)
ISBN 978-7-80762-395-3

I. 文… II. 程…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5213 号

网 址: www.360hours.com
邮 箱: expresskey@yahoo.cn
发行电话: (0431)86012826 (Fax)
(0431)86012675/86012812

文学的今天和过去 程光炜 著

出 版 人: 杨 枫
责任编辑: 孙炳银
封面设计: 李立嗣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130011
印 装: 长春市良原印刷厂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1/16
字 数: 251 千字
印 张: 16.5
书 号: ISBN 978-7-80762-395-3
定 价: 24.50 元

总 序

刘中树 张学昕

去年春天，在酝酿这套学院文学批评丛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谈论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定这种文学活动的学术品质，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或者说给今天的文学批评命名，实际上已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话语背景和学术空间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拓展，文学批评所显现出来的影响力，它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已世所共睹。文学批评持续着它整体活跃的态势。但是，近些年，那些“批评缺席”、“批评有无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诘责之声仍时而响起。当代文学批评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似乎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之中，很大一部分批评空间正悄然被诸多媒体所占领。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应有什么样的形态、格局和秩序？批评的伦理和能力、批评的学术化、批评家的身份等问题，都开始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回望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是有太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特别是种种体制内的评价机制，都很严正地考验着我们的批评品格。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背景下，批评的“学院化”取向愈益突出，也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虽然学院知识生产的先天优势被充分地彰显出来，知识、学问谱系化，精确、严谨的学术生长态势确实得到强化，但是，另一个令人堪忧的、窒息学术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被极大地扩张，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

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这与学院批评所应具有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对于批评来说，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若想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文学批评的命运和使命。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学术底蕴的丰盈与否。批评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今天的文学批评对学科话语的成熟，对文学史写作及其文学生态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就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位列这套“文库”的二十位学院批评家，正以他们文学批评写作的实绩、卓著的影响力，捍卫着批评的权威性和文学的尊严。这个批评家群体，凭借他们特有的活力、稳健和能动性，正形成一个新的批评风范和批评秩序。这种批评以或厚实或灵动的话语魅力、清醒的判断力，以及理论的热情、能动的解读和阐释，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我们体会到，在这里，批评确实是一个抵达心灵的创作性活动，是有灵魂重量的精神言表。活力与激情，学理与思想，深邃与轻盈，宏阔与精致，都充溢在他们文字的字里行间。还有，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时代和文学发问的能力，理论背景和批评立场，也都在他们执著而坚定的批评活动中尽显无遗。他们对我们时代文学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批评秩序的重新建构，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不夸张地说，学院精神的纯粹和魅力，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里获得深刻的锤炼和彰显。

可以说，《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才使学院批评变得坚实而有声有色。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感到，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和许多待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我们总是渴望和期待文学创作给我们增加更大的内心含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当代文学

批评是否向人们敞开了心扉，演绎本色的灵魂之舞呢？视野开阔了，但内心视域缩小了；对文学的宏观生态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但对许多独特文学个案的精彩阐释、分析却显衰微；有了雄心勃勃的“建构”的自信，却缺少“苦心孤诣”的“妙思”。而且，写作与批评这两条并置的“铁轨”，如何在生活坚实的地基之上，承载文学列车的驰骋，相互支撑、牵引和共同延伸？像这样涉及写作与批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学院体制内的量化指标、科研制度，极大地禁锢着学院批评家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激情。一旦批评家丧失掉对文学精神的真诚旨趣，必然导致批评家远离鲜活的文学现场，走进苍白而贫乏的困境。

无疑，我们时代需要更多富于激情的成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相对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纯理论研究，文学批评似乎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它所做的追踪式的、持续的、不倦怠的工作，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因此，它需要直面一切现实和文本的勇气与目光，需要科学、理性和公正的审美判断力。批评的价值立场、伦理操守、专业品质，在我们今天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珍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作家满怀信心，同时，我们也对这一个学院批评家群体充满期待。我们相信，我们会在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生活清新的气息和美好的未来。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社负责承担的。在此，我们要表达对总编辑杨枫博士的衷心感谢。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执著而坚定地坚持这套丛书的编辑，才使得这套学术丛书在图书市场渐显颓靡的当下能如愿出版。

最后，我们还是期待读者、期待学界朋友们的热忱指教。相信在这里，同样有我们之间真诚而丰富的内心交流。

目录

第一辑

当代文学在 80 年代的“转型”	3
评价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几个问题	21
批评“对立面”的确立	
——我观十年“朦胧诗论争”	31
文学的权利	45
知识与控制	
——论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对 80 年代文学的再评价、 再生产和再传播	69
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	81
处在转折期的 70 年代诗歌	94

第二辑

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中的身份确认	115
一个被“发掘”的诗人	
——《诗探索》和《沉沦的圣殿》“再叙述”中的食指	128
关于当前诗歌创作和研究的对话	142
文学与传媒的几个问题	156
“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	161

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中国文学·····	173
中产阶级时代的文学·····	184
当代中国文学中主体形象的变迁·····	199

第三辑

我们这代人的文学教育

——由此想到小说家浩然·····	215
------------------	-----

诗人·史家·政治家

——《我与郭沫若》导言·····	222
------------------	-----

在大地山河之间

——《我与茅盾》导言·····	228
-----------------	-----

想起萧红·····	233
-----------	-----

李长之和他的《鲁迅批判》·····	239
-------------------	-----

“新时期文学”的再叙述

——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242
-------------------------	-----

我看 2000 年版高中《语文读本》·····	244
-------------------------	-----

序《海子作品精编》·····	247
----------------	-----

序《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上海新书业》·····	250
-------------------------	-----

后 记·····	254
----------	-----

文学的今天和过去

第一辑

当代文学在 80 年代的“转型”

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

在 70、80 年代之交，由于历史语境发生重大变化，当代文学在 80 年代的“转型”就将不可避免。不过，这种“转型”不是彻底的、断裂的，而是贯穿了一个不断拒绝、重返、清理或挑选“十七年文学”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作为“当代文学”新的形象代言人的“新时期文学”，在强调自身独特性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是“历时性”或“共时性”的不同理解中的“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在历时性的线索中，它拒绝、批判和排斥前者极左的思想思潮和激进性文学实验；但是在共时性线索中，它又为被极左思潮长期压抑的文学性因素，如美感、感情、人道主义、中间人物论、形象、干预生活论等“正名”，将其吸收、消化和转换到“新时期文学”中来。另一方面，虽然语境变化，但社会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有所调整，也需要有一个缓慢和长期的过程，因此，在 80 年代“转型”的当代文学的文学体制仍然承袭着“十七年”的模式，只是在表现形式和结果上出现了较为弹性的迹象。然而，这一体制中的组成因素也处在裂变、调整、变异的进程中，如中国作家协会领导成员的日益多元化、职业化和年轻化，主流文学批评对意识形态色彩的逐步淡化，和 1985 年前后“先锋文学”等职业化批评家的出现等，都会对传统的文学体制、管理方式产生较大的冲击。这些因素，导致了一个时期的文学在繁荣中又经常出现反复和动荡的局面。

当代文学在 80 年代的“转型”，在 1977 到 1984 年间的表现是：在“十七年”中寻找“资源”，很多提法、主张，如“回到五四”、“新启蒙”等都是为了强化、放大

“十七年”而存在的。1977年11月、1978年8月,刘心武、卢新华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和《伤痕》先后发表。1979年,郑义的《枫》(2月)、靳凡的《公开的情书》(靳凡原名刘青峰,2月)、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2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2月)、方之的《内奸》(3月)、张弦的《记忆》(3月)、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3月)、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7月)、王蒙的《夜的眼》(10月)、宗璞的《我是谁》(12月)等短篇、中篇小说问世。^① 这些被称为“伤痕”、“反思”小说潮流的作品,主要延续的是“十七年”小说“干预生活”的叙事模式和文学想象。这些来自“十七年”的作家,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主流作家”。实际上不光他们,其他作家、以及同样为“主流作家”的知青作家,也主要是在“十七年”“干预生活”的文学观念和叙事方式中吸取了营养。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文学格局,除去文化思想的封锁、文学资源单一、作家的创伤性记忆等因素外,很大程度上还由于上述作者的文学教育、题材记忆、写作经验和叙述方式大多来自“十七年”的缘故。尽管出现了文学观念、主张的“转型”,但文学创作不可能在短时间就告别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文学记忆”。因此,在80年代的最初几年中,人们对当代文学“转型”的理解,明显停留在对“十七年”时期一度被压制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的水平上。那么,对当代文学“转型”的理解,就必然地会夹杂在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文学视野和历史叙述之中。“我在少年时代便参加了当时还处于地下状态的党组织所领导的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人民革命斗争。我从少年时代便成为这个党的一名战士”,因此,“我始终认为,文学和革命天生地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它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他坚信,文学与革命的“正宗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文学是革命的脉搏,革命的讯号,革命良心;而革命是文学的主导,文学的灵魂,文学的源泉。”^② 尽

① 郑义:《枫》,《文汇报》,1979年2月11日;靳凡:《公开的情书》,《十月》,1979年第1期;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红岩》,1979年第2期;方之:《内奸》,《北京文艺》,1979年第3期;张弦:《记忆》,《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收获》,1979年第2期;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王蒙:《夜的眼》,《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1日;宗璞:《我是谁》,《长春》,1979年第12期。

② 王蒙:《我在寻找什么?》,该文是作家为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所写的“序言”,载《文艺报》,1980年第10期。

管这只是王蒙个人的“表白”，它在其他作家那里存在着理解现实的差异性，但它仍表明，“十七年”作为一代作家的历史经验和文学记忆，一定程度上实际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想象与建构过程。它还在“新时期文学”最初几年，承担着思想解放“先驱者”、“代言人”的角色，在重返公众生活空间的同时，把“文化英雄”的观念、意识和自我想象方式，留在今天人们对新时期文学的记忆屏幕上。这个期间，虽然出现了“人道主义”、“异化”、“现代派”的争论，“现代派小说”开始登上文坛，但带着“回收十七年”特征的“伤痕”、“反思”小说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仍然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文学现象。

1985年前后，当代文学的“转型”在走过“回收”阶段之后，日益主动地表现出与“十七年”的历史相剥离的倾向。^①先后出现的诸多“文学事件”，如“文化热”、“方法论”、“寻根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等，不约而同地以“遗忘十七年”的方式展开了它对所谓“真正”的“当代文学”的“共同的想象”。^②“寻根文学”即是当代文学第一次没有采取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方式，而是以一种作为“文学传统”存在的而“十七年文学”并不存在的温和的讨论的方式而提出的文学主张。“寻根”提倡者显然是在与“十七年”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学层面阐释自己的理论主张的：“社会学当然是小说

① 人们把“1985年”看作“新时期文学”两个阶段之间的分界线，是否有充分的历史根据是可以讨论的，不过，这一年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如“寻根文学”的提出、“文化热”、“方法论”、“20世纪中国文学”等等，一定程度上传达着某种模糊而笼统的“文学转型”的时代律动和信息。因此此后，文学的重心开始由传统的“现实主义”转向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影响的“先锋文学”，后者的文学观念和叙述方式，对文学创作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示范”作用。杨庆祥曾通过对柯云路1986年创作、1987年拍成电视剧并在观众中引起轰动效应的长篇小说《新星》的分析，提出了“现实主义终结论”的说法。他认为，“改革文学可以说是这一‘现实主义’在1980年代最后的一次‘叙事冲动’，在《新星》、《平凡的世界》产生轰动并最终被排斥在主流文学叙事之后，‘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叙事’（讲故事）的方式已经失去其构建‘共同体想象’的话语权力。这正是‘改革文学’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之一，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形象，一个值得一再回首审视的话题，也为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种历史信念和‘共同体想象’的现实主义叙事——的终结提供了旁证。”（《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兼及对“改革文学”的反思），未刊）。

② 李陀和李劫都认为，“1985年”以前的“当代文学”只是称之为“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而不是“当代文学”。于是他们宣称，真正的“当代文学”是从“1985年”开始的。这种说法虽然充满质疑点，但确实又反映了研究者对当代文学“转型”的一种个人化的理解。

应该观照的层面，但社会学不能涵盖文化，相反文化却能涵盖社会学以及其它。”“由此，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① 这种试图从“十七年”传统中剥离出来的冲动，也被敏锐的批评家看了出来：“社会的概念以一个时代的生活为认知对象，共时性便是它的基本特征；而文化的概念以久远的历史积淀为前提，则更多地体现为历时性的特点”，因此，寻根作家的目的是“力图由此而达到对生活 and 人的整体把握”。^② 1985年出现的小说，例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王安忆的《小鲍庄》、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郑义的《老井》、阿城的《树王》、《孩子王》等，都试图“遗忘”历史这一“他者”的存在，冲出“十七年”的“结构力”框架。^③ 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既然已经脱离了与“十七年”的历史关系，也就意味着“摆脱”了文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1985年后的“新时期文学”，它的叙述中的“他者”，已经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人类文化”、“个人话语”等一些所指。进一步说，当代文学的“转型”，在摆脱了当代史的巨大压力之后，其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正在日益地感受到“走向世界”的巨大压力。而此时的当代文学，已经不是“十七年”那种“本土化”的当代文学，而日益变成了“新时期”那种“世界化”的当代文学。美国“垮掉派文学”对“第三代诗歌”诗人行为方式、生存状态和写作的启迪，法国新小说的观念和结构方式对先锋小说的影响，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成为不少寻根作家创作的摹本，都证实了一个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派”视野里

①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② 季红真：《宇宙·自然·生命·人——阿城笔下的“故事”》，《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

③ 这里的“历史”作为文学的“他者”而存在，中国文化属于“结构力”的文化，而日本文化则属于“没有结构能力”的观点，出自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0~170页。他写道：“因为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人们失去了面对西洋所产生的紧张和与亚洲的连带感，也就是说，失去了‘他者’。”如果说，“十七年文学”是一种有“结构力”的文学，“革命”的对立面恰恰是作为“他者”而赋予它文学创作的冲动的話，那么实际上，80年代的“寻根”、“先锋”文学，则是一种取消了“历史”这样一个“他者”的文学思潮。

的“当代文学”正在兴起的迹象。当然，有所不同的是稍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它的叙述格调有“黑色幽默”小说的痕迹，生活经验及其感受是中国的，显示出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浪漫化冲动在这里已开始收缩。无论社会还是文学，都将转入另一条轨道。

“中国作协”和“社科院文学所”

“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复杂关系，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形式、批评意识和功能在80年代的某些微妙变化，也能得以观察。

中国作协和社科院文学所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政治思想宣传需要而建立的两个文化、科研单位，50、60年代当代文学的重要批评活动，大多数是通过它们来组织和实施的。^①在50、60年代，当代文学的“批评”，可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内部批评”，其目的是削弱威胁当代文学权威理论的异己现象，通过对左翼文学队伍的调整、重组，把传统的左翼文学归置、集中、统一到“当代文学”的范畴之中。因此，作为组织、协调和领导当代文学的机构，它的成员的确定和变动，往往敏锐地反映着“当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位置和

^① 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应该是30年代成立于上海的“左翼作家联盟”、40年代延安的“文抗”、“鲁艺”。抗战胜利后，鲁艺和陕北公学等大专院校经过重组，分为两个部分，由周扬和艾青带队分赴东北、华北。周扬带队的鲁艺、公学师生，组建了东北三省的文联、作家协会、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艾青率领的两校师生先在河北正定组建华北联合大学（其中大部分在“文艺学院”），后改名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1950年进城后，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院”的骨干，如艾青、江丰、陈企霞、李劫之、彦涵、周巍峙、贺敬之、严辰、王朝闻，以及后来进来的光未然（张光年）、蔡仪等，改调成立不久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77年才正式成立，之前分为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北大文学研究所。50、60年代的负责人是何其芳，80年代由陈荒煤任所长。50至80年代，何其芳、夏衍、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陈荒煤、冯牧、贺敬之等被称为“周扬派”的文艺批评家，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胡适批判”和“新时期”初期一系列文学运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所在的这两个单位，成为体现意识形态愿望和“主流文学”性格的“前哨阵地”。也就是说，当代文学的“批评史”（1984年以前），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中国作协”和“社科院文学所”的“文学批评史”。90年代后，随着社会语境变化，当代文学批评队伍出现较大重组，例如社科院批评家调入大学和大学学院批评的兴起，其历史功能和阵地意识才逐步被削弱。

姿态。1966年，周扬在“文革”前夕受到批判，被解除职务，他控制的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解散。70年代末，被“平反昭雪”的周扬“重返文坛”。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夏衍、冯牧成为新的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1979、1981年在起草全国四次文代会“大会报告”和“批判《苦恋》”的问题上，这个群体出现了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其焦点，在如何认识和评价“十七年文学”的功绩、作用和得失上。由林默涵主持起草的“初稿”认为：“十七年”虽然有严重错误，“但并没有形成一条‘左’的文艺路线”，因此，“建国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周扬主导的“修改稿”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他认为“中间经过了重大的历史曲折”，原因是“左的错误是更多的”。与林默涵批评新时期小说“感伤主义”过多的观点相反，周扬认为“新时期文学”的成就“不但突破了‘四人帮’，还突破了‘十七年’。应该充分地加以肯定。”^①不久，与在批判白桦有“错误倾向”的电影《苦恋》主张采取“十七年”的严厉方式形成对比，周扬、张光年希望通过“修改作品”让电影重新上映。他们的态度，使作协领导的《文艺报》对作家作品采取了“异常宽容”的批评立场：“对待文学艺术的缺点错误，我们一定要采取稳妥的办法，任何横加干涉、简单粗暴的态度都是不利于发展文艺和安定团结的”，“过去和现在无数的事实证明，那样做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②一定意义上，四次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和《苦恋》的批判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它背后其实牵涉到如何认识“十七年”，并通过重评来建立“新时期文学”的合法性的问题。一种意见表现出以“十七年”为标准来统领“新时期”的倾向，它的规范性，并没有因为进入了新时期而失效；另一种意见则坚持，正因为“十七年”存在着左的错误，“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才得以彰显。80年代初期，鉴

① 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214页。在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风波”，尤其是“批判《苦恋》”之后，与周扬观点存在分歧的林默涵、刘白羽在作协的“领导地位”有所削弱，明显标志是，在1984年作家协会“四大”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中，和周扬一样主张对文艺“宽容”的张光年、冯牧等开始主导作协的工作。

② 1981年11期《文艺报》“社论”：《文学艺术的新局面》，《文艺报》，1981年6月7日。刚开始时，《人民日报》、《文艺报》都对作家抱有同情的态度，与《时代的报告》有所差异，后来受到压力，才对《苦恋》提出了“批评”。

于作家协会在当代文学体制中的特殊角色,它的价值选择仍然对文学的发展发挥着示范性、主导性的作用。

在80年代,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在“新时期文学”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理论主张的提出和文学发展的规划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与中国作家协会是不相上下的。^①而文学所对“新时期文学”的某种“规划”作用则更为突出。在50、60年代,文学所的学术研究色彩要比文学批评色彩浓厚。虽然也有人参与了胡适、胡风、冯雪峰、丁玲批判,俞平伯、陈翔鹤也曾被动卷入“红楼梦批判”、“历史小说写作风波”,何其芳还因“诗歌发展道路”问题发表过意见,但总的说,文学所还不是当代批评的中心。80年代初期,文学所逐渐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心之一。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研究室集体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所主办的杂志《文学评论》,以及陈荒煤、洁泯、何西来、张炯、蒋守谦、张韧、陈骏涛、陈燕谷、靳大成等人的文学批评,对反省“十七年”的历史功过、建立“新时期文学”的批评话语和知识立场,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②在80年代当代文学的“转型”中,文学所的三次“事件”(也可以称之为“文学现象”)如《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新时期文学六年》的出版、

① 建立于1953年2月22日。最初附属于北京大学,原名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由郑振铎任所长,何其芳任副所长。两年后,归属中国科学院,改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58年郑振铎遇难逝世,何其芳继任所长。研究所分设文艺理论、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民间文学以及苏联与东欧、西方、东方各文学研究组。1964年外国文学各研究组分出,另建外国文学研究所,从此该所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中国文学。1976年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随之改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沙汀任所长,陈荒煤、余冠英、吴伯箫、许觉民、王平凡任副所长。1982年起许觉民任所长,邓绍基任副所长。1985年起,刘再复任所长,马良春、何文轩、冯志正任副所长。研究所分设文艺理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鲁迅、民间、文学新学科等文学研究室(组)。余冠英、蔡仪、陈涌、唐弢、王士菁、贾芝等曾担任研究室(组)领导人。另有研究辅助单位:图书馆、资料室。编辑出版的期刊有《文学评论》(双月刊)、《文学遗产》(季刊),毛星、陈翔鹤曾任刊物主编。从1981年起,逐年编写出版《中国文学研究年鉴》。该所设有学术委员会,聘请所内外著名专家参加,钱钟书、俞平伯、季羡林、余冠英、吴世昌、孙楷第、蔡仪、唐弢、王瑶、毛星、贾芝、钟惦斐、朱寨等均担任过学术委员。

② 这一时期,尽管有的大学如北京大学谢冕等人在“朦胧诗论争”中比较引人注目,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中青年教师中也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家,但批评力量 and 影响还不如文学所那么集中、突出和广泛。